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論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與政治

On the War and Politics of Clausewitz: strategic Essay

doi:10.30390/ISC.199611\_35(11).0004

問題與研究, 35(11), 1996

Issues & Studies, 35(11), 1996

作者/Author : 譚傳毅(Chuan-I Tan)

頁數/Page : 49-6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96/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1\\_35\(11\).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1_35(1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論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與政治

譚傳毅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國際安全暨防衛博士)

## 摘要

克勞塞維茲的中心思想有下列三個重點：極點性與集體性、精神戰力至上原則、政治指導戰爭原則。其總體戰概念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實踐。在核子時代裏，總體戰的概念有一段輝煌的時光，但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總體戰遭到質疑。爲了「挽救」戰爭，終於發展出有限戰爭的概念。但有限戰爭並未真的挽救克勞塞維茲，它只是使戰爭變得「可行」而已；然而，武力的使用卻愈庸俗化、世俗化。這是克勞塞維茲戰爭思想所遭受的最大挑戰。事實上，克勞塞維茲的理論並沒有「破產」，真正思想破產的是那些胡亂套用理論的人。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戰爭不僅只是政治目標達成的手段而已，它還必須能夠限制政治意志漫無邊際的發展。

關鍵詞：克勞塞維茲、戰略思想、絕對戰爭、有限戰爭

\* \* \*

## 壹、前言

自從吉伯 (Jacques Guibert) 發現了國民兵、武力使用經濟法則的概念，<sup>①</sup>並由拿破崙實踐了吉伯的理論，戰爭的形態才算真正的「大型化」。毫無疑問，克勞塞維茲在讀了吉伯的書並親眼目睹拿破崙大軍鐵蹄蹂躪他的祖國之後，他看到了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戰爭的藝術、指揮官的天分、以及戰爭的激情等等。<sup>②</sup>在那個時代裏面，動員由全國公民組成的大規模部隊，占領敵人領土、毀滅敵人部隊、摧毀敵人的抵抗意志，是勝利的不二法門。

這種大型而殘暴的行爲從克勞塞維茲的眼中看來，屬於一個風險極高、極不確定

註① 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de Guibert,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 et "Traité de la force publique," *Ecrits militaires 1772~1790* (Paris: Copernic, 1977), pp. 54~69, et pp. 263~271.

註② Carl Von Clausewitz, *De la guerre* (Paris: Minit, 1955).

的領域；因此，暴力的行使是一種藝術，而不是約米尼所鼓吹的「科學」。③無論如何，從拿破崙之後，戰爭已經不再是中古時代武士之間「彬彬有禮」的決鬥，④戰爭是一種「零和遊戲」：我的失敗就等於你的成功。

克勞塞維茲可說是西方第一個系統化處理戰爭與政治的人，他的理論在今日仍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釐清暴力的行使與政治之間的邏輯關係，因為他的理論可能產生病變；尤其是在核子時代之中，暴力行使變成了家常便飯，它幾乎毀掉了我們對戰爭應有的態度：「慎戰」。這是筆者撰寫本文的最大動機。

首先，我們重新溫故克勞塞維茲的主要三大中心思想：強烈的主觀意志使戰爭趨向暴力的極點、戰爭是一種藝術、戰爭為政治服務。接著，我們討論克勞塞維茲觀念在核子時代中的適用程度。最後我們將發現暴力的使用不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它反過來支配著人類的行為。

## 貳、克勞塞維茲的中心思想

### 一、強烈的主觀意志使戰爭趨向暴力的極點

是什麼因素使得戰爭變得如此的殘酷？克勞塞維茲為我們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政治。由於在政治上敵人不願意執行我方的意志，所以我方就以暴力手段迫使敵人就範。⑤這是一種自然而盲目的衝動，是一種自由發洩的情緒。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以各種方法解除敵人武裝、消滅敵人，使他變得毫無還手的能力。於是，我們在軍事上的各種努力以及在政治上的意志，都必須符合並超過敵人的抵抗能力，以迫使敵人接受我們的要求。

克勞塞維茲認為下列三種情況將會使戰爭達到暴力的極點：「如果戰爭是孤立瞬間的行為，並與國家之過去不具無任何關係；如果決定戰爭的發起只有單一的決策，或由許多同步驟的決策組成；戰爭是這種決策的唯一結論，並毫不考慮在政治上會引發的反作用」。⑥相反的，如果要避免這種極端的情形出現，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政治主觀意志，及其「客體」(object)之間產生「差距」；也就是說，如果敵對雙方的政治意志都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內，或是彼此政治計畫的企圖心都不是很強烈；那麼，戰爭就將不會達到暴力的極點。但是根據克勞塞維茲的看法，在真實世界裏，這種要求是達不到的；因為一但戰爭發起，敵對雙方盲目的仇恨情緒，將推使一切暴

註③ Antoine Henri Jomini, *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campagnes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Magimel, Anselin et Pochard, 1816), et *Per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Paris: Ivrea, 1994). 約米尼與克勞塞維茲同時觀察了拿破崙戰爭，但是兩人所得到的經驗完全相反。前者認為我們可以為戰爭找到永恒不變的法則，「內線」、「機動」、「兵力集中於決勝點」，等等，是獲得勝利的原則。後者則將戰爭歸屬在「藝術」的領域當中，克勞塞維茲認為戰爭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因素的領域，我們很難為戰爭建立任何教條。

註④ Franco Cardini, *La culture de la guerre* (Paris: Gallimard, 1992), p. 18.

註⑤ 同註②, p. 51.

力、政治意志等等達到極端。

阿宏 (Raymond Aron) 認為這種暴力的上升只存在於中古時期的武士決鬥，因為這種決鬥一定會分出勝負來；但是在政治指導戰爭的世界裏，暴力的盲目上升並不存在，因為，當某方的政治目標達到之後，他就終止戰爭了。但是阿宏提醒我們，如果敵對的情緒與形勢愈接近死亡決鬥的理想型態，這種抽象的暴力上升辯證很可能會發生。<sup>⑥</sup>對阿宏以及克勞塞維茲而言，戰爭形成了它特有的「集體性」(totalité)、與「極點性」(polarité)。但是，戰爭的整體性只是「片面的」(partielle)，因為戰爭必須嵌入另外一個更廣泛的「集體性」當中；這就是政治：<sup>⑦</sup>政治決定了戰爭的發展。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從主觀意志的世界中走向客觀的環境裏，就將可以重新定位兩個敵對的主觀政治意志。對克勞塞維茲而言，主觀意志與客觀環境之間緊密相連；政治決定一切。如果主觀意志十分強烈，政治目標亦愈「野心勃勃」，達成這個政治目標的企圖心亦愈強烈。換句話講，如果無條件勝利是唯一的政治目標，暴力就將達到其極點。

根據阿宏的看法，介於主觀意志與政治目標之間的橋樑是「決策」。<sup>⑧</sup>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下這個決定。關於這一點，阿宏與克勞塞維茲的看法完全一樣；他們一致認為這種決定是一種「藝術」，只有像戰爭這種高度不確定的事物，才是指揮官發揮其天分、勇氣的時機與場所。是人制訂其政治計畫，是人決定戰爭的進行與發展以達到其政治目標。似乎從他們的眼中看來，不論我方的政治計畫如何的野心勃勃 (ambitieux)，敵人都必須自動的接受，否則就發動戰爭。這就是克勞塞維茲所謂的「集體性」與「極點性」。

## 二、戰爭是一門藝術

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第二個看法在於「機率」(probabilités) 以及風險或機會 (hasard)；它們是兩個絕對、極端的概念。<sup>⑨</sup>如果排除了這兩種概念，剩下來的就是我們的「判斷」(jugement) 了。當我們漸漸的進入暴力的領域之後，這種「判斷」指導所有的戰鬥。事實上，這種判斷就是上述所謂的「決策」，但這是一種純粹主觀的決策，是一種自然而盲目的衝動，是一種自由發洩的情緒，它將會達到暴力的極點。就是因為戰爭「可能」會趨向暴力極點，使得它變成像是一種「情感」(趨向暴力極點的情感)的「遊戲」；根據克勞塞維茲的看法，這種「判斷」卻和機率有關。當然，它並不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因為戰爭與和平只有一線之隔，全在最高決策者的「一念」之間。情況就變得很「簡單」了：我們「猜」敵人的企圖，同樣的，敵人也「猜」我們的企圖。但是這種「猜測」並不是一種很好的「判斷」標準，因為任何

註⑥ 同註②, p. 55.

註⑦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aris: Calmann-Lévy, 1962), p. 34.

註⑧ Raymond Aron,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 tome I, l'âge européen* (Paris: Gallimard, 1976), p. 187.

註⑨ *Ibid.*

註⑩ 同註②, p. 58.

一方都可能「猜」錯了對方的企圖而造成不幸。

除了主觀的意志之外，戰爭尚有其客觀的因素：機率的計算。主觀的「判斷」、「機率」與「機會」才牽扯上了關係，機率與機會使得戰爭變成敵對雙方的一種計算遊戲。誠如克勞塞維茲所言：「戰爭是人類最依賴機率與機會的行為」。<sup>①</sup>接著他進一步說明：「如果我們要實現這種遊戲，則它必須和「運氣」(chance)與偶然性(accidentel)有關……，因為所有的戰爭都是危險的」。<sup>②</sup>就是因為戰爭是一個危險的領域，所以指揮官就必須格外具備強烈的精神力量與勇氣，以克服危險與不確定因素。克勞塞維茲認為指揮官必須要有智慧(intelligence)、果斷(résolution)、機智(présence d'esprit)。智慧屬於一種精神，儘管在最黑暗、最渾沌不清的狀況當中，它都能引導我們走向真理。果斷就是勇氣，它使我們得以堅定的跟隨智慧的引導。機智是一種及時的反應，在面對意外的時候它能夠迅速找到脫困的方法。John Keegan 在分析了亞歷山大大帝、威靈頓公爵、格蘭特將軍、與希特勒的戰爭之後，發現了領導統御的法則；他認為指揮官必須合乎下列四種要求：親和力、雄辯的口才、懲罰、力行模範。<sup>③</sup>這些都是指揮所必備的素質，它能造就一個「天才」指揮官。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理性的計算與精神力量串聯在一起。原則上，克勞塞維茲並不認為理性計算比精神力量重要；他把戰爭視為一個人類本性充分發揮的領域，它不是科學方法可以度量的，戰爭是一種藝術，是人類發揮潛能的藝術。理性計算並不能為藝術提供任何發展的基礎。阿宏非常同意克勞塞維茲的觀點：「他(克勞塞維茲)反對宣稱能夠重建戰略的假理性主義(pseudo-rationalistes)，反對輕浮草率的人與不確定因素；因為輕舉妄動與意外是科學的天敵，它們鄙視求知慾旺盛的軍官。」<sup>④</sup>同時阿宏又接著說：「機械的理性計算最大的挑戰並不是物質，而是精神(moral)因素。」<sup>⑤</sup>阿宏因而認為機率與機會的功能在於揭露出戰爭的不確定因素，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下一個「決定」；而理性的計算只是便利我們下一個決定而已。

### 三、戰爭為政治服務

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第三個看法是：「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sup>⑥</sup>如果戰爭不接受政治指導的話，那麼它將只是一場無止盡的戰鬥而已，它將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因此，克勞塞維茲特別強調政治與戰爭的目標。他認為，有時候政治目標與戰爭目標相互重疊，但有時候政治目標不能夠成為戰爭目標。例如在波斯灣戰爭時，政治目標「應該」是將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以及解除海珊政權(布希總統在公開場合講

註① 同註②, p. 64.

註② 同註②, p. 64.

註③ John Keegan, *L'art du commandement, Alexandre, Wellington, Grant, Hitler* (Paris: Perrin, 1991), pp. 364~379.

註④ 同註③, p. 219.

註⑤ 同註③, p. 223.

註⑥ 同註②, p. 59.

過)。

但是軍事行動只是將伊拉克部隊逐出科威特而已，並沒有繼續進攻巴格達。⑥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就必須很謹慎的選擇軍事目標，以求取政治與戰爭之間的均衡。如果敵人大規模部隊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則形勢就愈鬆弛，政治目標本身則將變成一個主要的支配因素。⑦重要的是，政治目標與戰爭目標的關係為何？戰爭何時可以結束？關於這一個問題，克勞塞維茲把政治的層次拉抬得相當高，他認為政治是最高等的心智的活動，戰爭只是它的一個臣子。政治絕不能反過來接受戰爭的指導，它一定是站在戰爭之上：「是因為政治引發戰爭，政治是一種智能，戰爭只是它的工具」⑧。從邏輯上來講，既然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它就得接受政治的指導；政治完全支配了戰爭的目標與戰爭的進行。

對於第二個問題，克勞塞維茲認為戰爭的唯一結局是最後的勝利。號稱「克勞塞維茲第二」的阿宏⑨不相信克勞塞維茲不知道「和平」的概念，因為他曾親眼目睹拿破崙大軍蹂躪歐洲以及他的祖國，也親眼看到拿破崙戰爭的失敗；阿宏解釋道：「這是因為拿破崙的野心太大，他只相信武力的功能。克勞塞維茲非常了解這一點。」⑩根據阿宏的看法，所謂的「勝利」只是戰術上的字眼，而並不屬於戰略的層次。這是個純粹的軍事術語，它只是結束戰爭、迎接和平的一個方法。如果和平不是最後真正的結果的話，政治也就再也無法指導戰爭了。⑪根據這種邏輯，指揮官的天分（智慧、機智、決心、勇氣等等）必須幫助他來下個正確的戰爭決策、與政治需求；這兩者決定了戰爭的發展。而這個戰爭就是所謂的「總體戰爭」，它的最後目標在於使用武力強迫敵人貫徹我方的意志。阿宏與克勞塞維茲兩人同時追求「極端的暴力」。

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從和平轉變到戰爭的過程很長或很短？在古典時代裏，戰爭與和平是兩個完全對立的觀念，從和平時期演進到戰爭狀態的時間相當短促；只要敵人不接受我們所提的條件，我們就發動戰爭。但是在核子時代中，狀況就不是這樣了；核武嚇阻戰略的目標就是禁止敵人輕易而草率的行動。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觀察到，當前世局不只是處在戰爭與和平的兩種狀態而已；他並不認為沒有戰爭的時代就是和平。他認為克勞塞維茲只發現了「靜止的狀態」（*état de repos*），而沒有「緊張的狀態」（*état de tension*）的概念。⑫Schmidt 認為所謂「緊張」

註⑥ Lucien Poirier, "La guerre du Golfe dans la généalogie de la stratégie," *Stratégique*, No. 50~51 (mars/avril, 3e trimestre 1992), p. 35.

註⑦ 同註⑥, p. 59.

註⑧ 同註⑥, p. 706.

註⑨ Claude Le Borgne, *La guerre est morte*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87). 作者認為自從發明原子彈之後，戰爭就已經「死亡」(*La guerre est morte*)了，而活在核子時代的阿宏卻仍然追隨克勞塞維茲的腳步，「嚮往」總體戰爭。作者因而命名阿宏為克勞塞維茲二世。

註⑩ 同註⑧, p. 173.

註⑪ 同註⑧, p. 174.

註⑫ Christian Schmidt, *Penser la guerre, penser l'économie* (Paris: Odile Jacob, 1992), p. 152. Christian Schmidt 曾經是阿宏的助理，他這本書的書名就是阿宏為他取的。

的概念不是指真實軍事行動，而是指武力使用的可能性(*l'emploi virtuel de forces*)。他的觀念與謝林(Thomas C. Schelling)<sup>②</sup>的看法很接近：戰爭只是一種粗暴的外交遊戲而已。當然，這裏的外交指的是超極強權的外交，只有超極強權才有資格玩「暴力」的遊戲。無論在戰爭或在外交的領域中，除了約米尼之外，幾乎所有的戰略家都一致認為暴力的行使是一種藝術，它是決策者或指揮官的高度心智活動。

矛盾的是，儘管阿宏與克勞塞維茲都反對「科學」戰爭，認為戰爭是一種藝術，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因素的領域；然而他們卻一致認定戰爭必須臣服於政治指導的「規則」。他們所反對的，卻是約米尼所贊成的；他們所贊成的，卻是約米尼所反對的。<sup>③</sup>克勞塞維茲戰爭接受政治指導的「規則」在普法戰爭、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完全得以實踐。在這裏我們只能說，克勞塞維茲這種對戰爭與政治之間關係過於機械性的陳述，使得最高決策者很難去向後反思、並思考敵人的反應方法，而只考慮到自己的政治目標是否達成。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就是這種思考模式之下的產物。<sup>④</sup>

毫無疑問的，克勞塞維茲對戰略研究的最大貢獻，就是他發現了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戰爭的集體性與極端性、指揮官對風險意外的運用藝術。在他的指導之下，戰爭找到了它的「絕對性」。

## 叁、絕對戰爭的迷思

### 一、克勞塞維茲的破產？

在建立民族國家之後，戰爭災難不只是存在軍人社會當中，同時它還席捲了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這就是現代戰爭的特質，它愈來愈血腥、愈來愈趨向其總體性。原子彈出現之後，人類終於發明了「集體自殺」的工具。

註② Thomas C. Schelling, *Stratégie du conflit* (Paris: PUF, 1985), et *Arme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註③ 「原則上」，約米尼認為戰爭有其基本規律，在真實戰場上我們活用這些規律，就會獲得勝利。更重要的是，戰爭必須要能夠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而不能像拿破崙戰爭一樣漫無節制。但是克勞塞維茲卻認為在政治絕對正確的前題之下，戰爭全然是指揮官的心智活動，指揮官不應死背準則作戰，而應該根據他的智慧、決心、機智、與勇氣贏得戰爭，達成政治目標。約米尼將拿破崙的戰術戰法全盤予以理性化，克勞塞維茲看到的卻是戰爭不幸的結果。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戰略研究的領域裏面，約米尼與克勞塞維茲的看法不該是對立的；他們的觀念是互補的。

註④ Bruno Colson, *La culture strategique américaine, sous l'influence de Jomini* (Paris: Economica, 1993), pp. 243~250. 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所領導了一群由美國大學、民間公司不同領域的學者教授與主管所組成的所謂「智庫」，為美國國家戰略提供研究與建言。這批從未拿過槍桿子的學者教授、以及麥納馬拉本人都非常排斥美國軍人對戰爭的傳統思考方式，因而設計出一種新的戰爭型態；這就是聞名的「不求勝戰爭」。戰爭的目標並不在於全面摧毀敵人，而只是運用武力迫使北越屈服於美國的政治要求。只是，北越打的不是這種戰爭，北越更靈活運用戰爭與政治，使得美國疲於奔命於談判桌與叢林戰場之間。後來麥納馬拉本人亦認為當時他們作了一個錯誤的決策。

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是否可以不計一切代價使用這種集體自殺工具來達成政治目標，就像我們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作的一樣？很明顯，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任何正常的人都有生存的意志與慾望，再加上兩次世界大戰的不幸，使人類不得不去反省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原子彈存在的事實，接下來就進入原子彈與戰爭的關係。我們將會發現，克勞塞維茲的觀念面臨了巨大的挑戰，但它還是很「矛盾的」活著。

普瓦利耶（Lucien Poirier）將軍認為，核子戰爭的本質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可說的」（le dit），另一個是「不可說的」（le non-dit）。①前者指涉「核子彈所能作的」（ce que peut la bombe）；後者意指其暴力的意義以及其在時空的功能」。到底核子彈能夠作什麼？它能夠被視為一種「超級大砲」而在真實戰場中使用嗎？它是否仍然可以作為指揮官表現其天賦的工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像阿宏所說戰爭的要素是精神而不是物質效應，②那麼核子彈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核子戰爭與「傳統」戰爭再也沒有界線，核彈的使用就像陸軍野戰部隊中的榴砲一樣簡單。

因此，要了解核子戰爭的本質必須先要知道核子彈能夠「作」什麼。

布羅地（Bernard Brodie）是第一個核子戰爭專家，他在一九四六年首先宣稱原子彈是一種「絕對武器」（Absolute weapon）。③這種絕對武器改變了戰略思想，他預見這種武器可以毀滅全世界的都市，它的威力與射程愈來愈大、愈遠，杜黑主義（Douhetisme）的復興，原子彈的數量優勢不是戰略優勢的保證，要注意敵人對我方原子彈暗中破壞的行動，世界原料的生產大量增加，原子彈可能進一步擴散至其他國家。④這就是所謂的「絕對武器」，在政治的指導之下，它能夠完全迫使敵人屈服於我方的意志，完全實踐克勞塞維茲的理論。即使後來發展出威力較小、射程較短的戰術核子武器，以期減少核彈的破壞威力；但敵對雙方之間的仇恨、敵對情緒、戰爭激情的趨使等等，亦將使戰爭一步一步走向暴力的極點。這是克勞塞維茲理論輝煌的勝利。

然而，當敵人也擁有這種絕對武器之後，狀況就不一樣了；任何一方將無法完全的迫使對手屈服，因為對方也已經具有完全毀滅我方的能力。只要有一方貿然的開火，結局不是「你死或我亡」，而是「大家一起死」。因此，研究核子戰爭的第一個認識是要知道這種絕對武器能夠「作什麼」。關於第二個認識，誠如普瓦利耶將軍指出，要知道核子彈的暴力意義及其在時空的功能。所謂核彈的暴力意義其實很簡單，在物質方面，我們一致假設其毀滅力量趨近於百分之百，這種絕對毀滅能力將會使敵對雙方的決策者感到「害怕」，而不貿然的發動核子戰爭。所以，核子彈的毀滅能力不

註① Lucien Poirier, *Stratégie théorique II* (Paris: Economica, 1987), p. 320.

註② Raymond Aron,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 tome I, l'âge européen* (Paris: Gallimard, 1976), p. 223.

註③ Bernard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6).

註④ 同註③, pp. 25~66.



只是物質方面而已，同時，它還擁有非常巨大的心理效應。這就是核子暴力的意義。所謂核彈在「時空」中功能的意義，指的是引發核戰的機率。我們絕對不能使敵人去「猜測」我們的報復決心。如果敵人認為我方報復的機率趨近於零或很低，這等於鼓勵敵人向我們發起攻擊。所以，我方報復決心（也就是所謂的第二擊）的機率必須等於或趨近於「一」。

理論上，這種決心將可以迫使敵人在行動之前必須先考慮我方的「必然」反應，因而放棄他的攻擊計畫。這就是吳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所謂的「核子恐怖平衡」；<sup>⑨</sup>它構成了物質的效應產生心理效應的核子嚇阻戰略邏輯。這種恐怖平衡或稱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s）是核子嚇阻戰略的基本概念。

誠如阿宏與克勞塞維茲所說，這純粹是決策者高度心智的活動；只不過是，決策者所作出來的決策必須是「不戰」，而不是「戰」；這是傳統戰爭與核子戰爭最大的區別。克勞塞維茲思想再度照亮了戰略研究的領域。

拉丁諺語說得好：「Si vis pacem, para bellum」，這意思是說，如果你要和平，就要準備戰爭（Si tu veux la paix, prépare la guerre）。無論是在傳統時代或在核子時代中，「絕對戰爭」一直都存在，而且它還是「以戰止戰」的唯一方法。只是在核子時代裏，決策者必須去思考核子武器的恐怖效應；否則，在沒有任何限制條件的狀況之下，戰爭的發起就太容易了。核兵器使戰爭變成敵對雙方決策者之間的心智鬥爭，核子嚇阻戰略變成一堆華麗的政治辭藻，他們虎視眈眈的找尋對方弱點。

誠如普瓦利耶將軍所說：「戰爭是一種政治自由行動的鬥爭，每一方都試圖去獲得或保有最大程度的戰略自由行動權，在另一方面，卻禁止對方達成同樣的目標」。<sup>⑩</sup>根據普瓦利耶將軍的看法，這種政治自由行動權係建立在防衛國家安全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個最起碼的界線。在這個界線裏面，雙方都享有自由行動權，超過了這個界線之後，就進入戰爭的領域了。

因此，敵對決策者之間的心智活動必須排除所有的「不確定因素」，雙方才會「相信」彼此的保證毀滅是「真」的。幾乎所有的核子戰略專家都忽略了這一點。就像阿宏認為精神支配戰爭，但是這種「精神」是抽象的，不是理性計算的過程與結果；它的唯一結論是軍事勝利達到政治目標。阿宏卻把戰爭引到了「不確定」的領域當中，但是，不確定因素卻是核子嚇阻戰略最大的敵人！事實上，我們絕不能忽略決策者的心智活動、或其「精神」（理性），因為這種活動將引導他作成最佳的決策。普瓦利耶將軍認為這種精神活動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決策者的最佳品質表現在其最佳的計算」。<sup>⑪</sup>在這裏，我們必須謹慎的區分克勞塞維茲的絕對戰爭，以及理性計算產生的相互保證毀滅戰爭。第一種形式的戰爭把不確定因素視為指揮官心智活動

註⑨ 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No. 211 (January 1959), traduit par Catherine Ter Sarkissian, dans Gérard Charliand, *Anthologie de la stratégie des origines au nucléair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0), pp. 1304~1310.

註⑩ 同註⑨, p. 211.

註⑪ Lucien Poirier, *Les voix de la stratégie* (Paris: Fayard, 1985), p. 80.

的要素，心理、以及在物質的作用將引導決策者走進極端暴力的層次裏。在這種情況之下，戰爭只有一種形式：總體戰爭；它不可能與「有限戰爭」共同生活在一個屋簷之下。這充分的說明了為何克勞塞維茲要到晚年才發現有限戰爭的概念；因為絕對戰爭的魔咒遮蔽了他尋求智慧的光線，莫名愛國心的勇氣趨使他走到了絕對戰爭的死胡同。他批評約米尼為戰爭建立法則是謬誤的，但是他自己卻掉進了絕對戰爭與絕對政治的陷阱裏面不可自拔。

第二種絕對戰爭，也就是理性計算所獲得的相互保證毀滅，是在決策者的腦海裏面進行對風險、成本、預期利得的計算；而不只是風險計算而已。如果沒有這些「物質」因素限制決策者，就只剩下純粹「精神」因素了，戰爭將是不確定因素的產物，它將盲目的走向暴力的極點。核子嚇阻戰略的中心思想就是如此：一方面，我們揚棄克勞塞維茲的絕對戰爭，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重拾他的絕對概念建立理性的嚇阻戰略。當然，戰爭繼續作為為政治服務的臣子，只是，「理性」從此變成決策者與核子戰略家唯一遵循的法則。核子兵器的絕對毀滅效應限制了政治野心，但很矛盾的是，暴力卻變得更「庸俗化」與「世俗化」。

## 二、戰爭的有限化

我們不禁疑問：自從發明原子彈之後，是否戰爭就已經「死亡」了？如上面所說，核子嚇阻戰略（或相互保證毀滅）代表了克勞塞維茲絕對戰爭思想的「新生」；但是，相互保證毀滅卻產生了一些「不安」的想法：因為相互保證毀滅代表著整體局勢的穩定，是否這將意味著戰爭將永遠凍結了？如果這種「關切」是真的，弦外之音是否暗指克勞塞維茲戰爭理論的破產？如果敵人「技巧」的避開相互保證毀滅，而進行小型衝突的話，怎麼辦？這一系列的假設性問題促使美國官方及學者進一步思考解決方式。

在韓戰結束之後，美國展開對原子兵器的論戰：它是否可以在有限戰爭中使用？美國國務卿杜爾認為巨型報復教令過於極端，不符合現實，美國必須發展出較小型的原子兵器，以化解敵人入侵美國的企圖。<sup>④</sup>這為有限戰爭的發展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動力。於是根據韓戰的經驗，季辛吉、奧斯古(Robert E. Osgood)、與布羅地等人明確的定義了有限戰爭。季辛吉認為有限戰爭是「為了某些特殊的政治目標，這些特殊政治目標使得現行武器系統及其使用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這是一種改變敵人意志的作為，而不是要消滅敵人；有限戰爭不是一種長期抗戰，它將有利於和平的到來」。<sup>⑤</sup>奧斯古認為在有限戰爭當中，「敵對雙方都限制其目標、及其鬥爭對象，以便達成明確而具體的目標；這些目標並不需要作太多的努力就可以達成，並還可以用協商的方

註④ cité par Philippe Moreau-Lefarges, *Les fondamentaux problèmes stratégiques contemporains* (Paris: Hachette, 1992), p. 49.

註⑤ Henry Alfred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7), p. 140.

式達成。」<sup>⑤</sup>布羅地則認為：「有限戰爭意指一種非常謹慎的克制程度」。<sup>⑥</sup>

從以上的定義中我們可以快速的得到一個結論：有限戰爭是敵對雙方決策者間的意志鬥爭，目標的達成與武力使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目標不能太具野心而必須非常「謙遜」，才較「容易」達成。很明顯的，以往相互保證毀滅的「野心」就未免太「大」了。在這情況之下，核兵器使用變成一種「勒索」、「敲詐」、以及「威脅」的工具。它所要消滅的不再是敵人的武裝，而是敵人的意志。<sup>⑦</sup>我們限制戰爭的目的，是因為我們不願再使暴力走向其極點；總體核戰的破壞性與毀滅性將超過傳統戰爭的千百倍。

普瓦利耶將軍指出，「有限戰爭的確是一種突破性的概念，有限核子暴力的使用不但拯救了總體核子戰的罪惡，而且，它還重建了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sup>⑧</sup>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克勞塞維茲戰爭與政治概念的重生。另一名作者謝林，更是將有限戰爭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至；他指出，有限戰爭只是我們用來嚇阻敵人的一種威脅工具而已。如果敵人不遵守我們所制定的遊戲規則，我們不排除有限戰爭的可能性。<sup>⑨</sup>根據這種邏輯，有限戰爭變成了外交的工具，暴力行使的層次降得更低，它不再與傳統核子戰爭處在相同位置；所謂嚇阻不再只是消滅敵人都市人口（*contre-cité*）、經濟與工業中心，或解除敵人武裝（*contre-force*）。嚇阻是以武力潛在性的使用去影響敵人的政治企圖，所以，政治與外交是血腥暴力的。<sup>⑩</sup>暴力行使不再是一件神秘、困難的事情。

現在，暴力行使的藍圖終於明朗化了；暴力行使有三種等級：小型傳統戰爭、有限核戰、總體核戰。三者呈階梯式發展，最後達到總體核戰的境界。這是布羅地所謂的「戰爭升級」（*escalation*）的概念；<sup>⑪</sup>康恩（Herman Kahn）更機械化的將這種升級劃分為四十四種等級，分別在不同場合中使用。<sup>⑫</sup>一旦這種戰爭呈階梯式的上升，它將是不可想像的（*unthinkable*）。<sup>⑬</sup>無論這種戰爭是否可以「想像」，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由於暴力使用的程度及層面已經降低，政治更容易介入戰爭，並指導

註<sup>⑤</sup> Robert Endicott Osgood,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 Strate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238.

註<sup>⑥</sup>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24.

註<sup>⑦</sup> Raymond Aron,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 tome II, l'âge planétaire* (Paris: Gallimard, 1976), p. 241.

註<sup>⑧</sup> Lucien Poirier, *Des stratégies nucléaires* (Paris: Historiques, 1988), p. 96.

註<sup>⑨</sup> Thomas C. Schelling, *Stratégie du conflit* (Paris: PUF, 1985).

註<sup>⑩</sup> Thomas C. Schelling, *Arme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5.

註<sup>⑪</sup> Bernard Brodie, *Escalation and Nuclear Op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07~108.

註<sup>⑫</sup> Herman Kahn, *De l'escalade, métaphore et scénarios* (Paris: Calmann-Lévy, 1966).

註<sup>⑬</sup> Herman Kahn,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in 1980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et *On Thermonuclear War* (Glenview: Greenwood, 1978).

與管理戰爭。現在問題變成了「誰來限制有限戰爭」？或是「衝突管理」的問題，以防止小型武裝衝突擴大為有限核戰、甚至是總體核戰。衝突管理就是危險的控制；例如在車禍管理當中，我們告訴駕駛人，如果你不繫安全帶發生車禍時受傷的機率是〇·二，再加上車子輪胎氣壓不足，則車禍的發生率可能高達〇·四，如果駕駛人開快車，發生車禍的機率增加為〇·七，如果再加上駕駛人大量酗酒，那麼發生車禍的機率接近於一。可是，這種說法可能產生一種負面想法：只要駕駛人開車前不酗酒、綁好安全帶、作好事前檢查，並假設其他駕駛人也像他一樣，那麼他將「永遠」都不會發生車禍。管理衝突的原理就像車禍管理，我們告訴敵人必須遵守某些遊戲規則，並禁止他超過某些界線，否則，他將遭到我方的懲罰與報復。<sup>④</sup>但是我們如何決定這些界線或遊戲規則？在核子嚇阻戰略裏面，有一項鐵律是不變的：「相互保證毀滅」。然而，相互保證毀滅卻限制了敵我雙方的行動能力；於是，為使雙方都能夠行動，暴力使用的範圍與層面必須縮小、限制。問題回到原點：在那裏行動？答案：既然不能在自己家裏面行動，那麼只好到「別人家」中去玩。

在「別人家」中，由於敵我雙方知道彼此的懲罰與報復的層次不會很高，所以一旦敵人判斷他行動損失的價值低於其預期利得時，他就可能會選擇「行動」；因為他根本不相信我方的嚇阻。在冷戰時期，這種小型武裝衝突到處都是，在東歐、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等。這充分的說明了為何超級強權如此「熱衷」於衝突管理，因為這種衝突根本就不是發生在他們家裏面！

我們必須承認，在理論上，衝突管理是為「拯救」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與政治概念，使得武力得以真正的接受政治的指導。現代戰爭因而產生一種二律背反：一方面，我們認為衝突可以管理，但在另一方面，當衝突管理「失敗」之後，戰爭可能將趨向其暴力的極點。在這兩律當中，有限戰爭很矛盾的存在著。在實際上，衝突管理與有限戰爭是超級強權的「專利」；衝突管理的基本假設是「風險承擔」的問題：兩個敵對的超強認定在第三世界中，他們承擔核子戰爭的風險很低；只有在第三世界中才能真正的使用武力，武力使用才能真正的接受政治的指導。如果克勞塞維茲早一點認識核子彈就好了！

## 肆、結 論

克勞塞維茲發現了戰爭與政治的關係，在政治指導之下的戰爭才真正的具有其意義。一方面，他認為我們無法以科學方法或理性的態度去為戰爭建任何準則與教條，但在另一方面，他卻堅決的認定戰爭為政治服務的規律。毫無疑問，克勞塞維茲戰爭與政治理論「科學性」的成分比「藝術性」的成分還高；儘管他反對任何形式主義，但他仍掉進了「假理性主義」的陷阱。

事實上，克勞塞維茲的理論並沒有「破產」，真正破產的是那些胡亂套用理論的人。「戰爭為政治服務」這句話，很不幸的，使政客得以將暴力使用合理化；「合理」的暴力使用，不管這種暴力是多麼的微小、謙遜，製造了大批冷血的劊子手。政客只

註<sup>⑤</sup> 同註<sup>④</sup>，pp. 58~62, pp. 96~97, et pp. 230~238.

考慮其政治目標是否達成，忘記了在叢林、在都市遊擊戰中死傷的人們，不管他們是敵人或朋友；忘記了大批在家中等待戰士返鄉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

這就是我們必須重新檢討克勞塞維茲理論的原因，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武力的使用也就是戰爭；戰爭所代表的不只是政治目標達成而已，它還必須具有巨大深遠的社會意義，它必須能夠限制政治意志漫無邊際的發展。這是我們重讀克勞塞維茲理論最大的收穫。

\*

\*

\*